Leimberg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史蒂夫·莱姆伯格的遗产规划

电子邮件通讯存档 消息编号 #2507 日期：

2017年1月20日

主题：查理·道格拉斯：家庭财富与遗产规划的更佳范式、对幸福的追求以及精神资本的重要性

“一月是制定崭新而有意义的决心的绝佳时机，这也是传统习俗。今年，让我们决心让家族财富与遗产规划变得更清晰、更具个性化，并帮助客户传承他们的价值观。作为顾问，让我们以真正的顾问身份通力合作，并采纳一些新的最佳实践。

无论今年国会是否呼吁修改所谓的‘遗产税’，我们都应认真考虑客户当前对变革的呼声。事实上，家庭财富与遗产规划确实存在一种更佳的范式。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为客户提供这一方案；真正超越信仰或准则的束缚，充当他们的顾问。”

本周我们以**查理**·道格拉斯的评论作为结尾，他提出了家庭财富与遗产规划的更佳范式，其中包括对幸福的追求以及精神资本的重要性。

查理·道格拉斯（Charlie Douglas），法学博士**（JD）**、**注册财务规划师（CFP®）**、注册遗产规划师**（AEP®）**，在商业、税务、遗产及财务规划领域从业逾30年。他拥有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并持有注册财务规划师™（CFP®）和注册遗产规划师（AEP®）资格认证。查理现任Cedar Rowe Partners财富规划总监，专为企业主、高净值人士及其家庭提供全面的规划解决方案与服务。 在加入 Cedar Rowe Partners 之前，查理曾在美国富国银行私人银行以及多家律师事务所和财务规划机构担任高级职务。作为全美遗产规划师与理事会协会（“NAEPC”）的董事会成员，查理曾担任《NAEPC *遗产与税务*

的编辑，目前担任 NAEPC 多学科协作委员会主席。他还是佐治亚州信托法分会立法委员会成员以及亚特兰大遗产规划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查理经常为多家专业组织做演讲，同时也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CNBC*、*《投资新闻》*、*《基普林格》*和*《福布斯》*等全国性出版物的撰稿人和评论员。

以下是他的评论：

执行摘要：

本期通讯的灵感源于近期发生的三个事件。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使我坚信，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当坦诚地考虑改变对家族财富和遗产规划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其的定义，并就此确立一些新的最佳实践。

第一件事发生在最近一次全美遗产规划师与理事会协会（NAEPC）高级遗产规划策略会议期间，某晚我与*《家族财富：让财富留在家族中》*一书的作者杰伊·休斯（Jay Hughes）偶然交谈。杰伊原定于次日就家族财富的维度发表演讲，这既基于他本人在书中最初提出的观点，也延续了哈佛大学资深慈善顾问查尔斯·W·科利尔（Charles W. Collier）在其著作*《家族财富》*中的论述。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参加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开设的“特许慈善顾问（**CAP®**）”课程期间，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再次令我深有感触。

第三件事源于我重读了**罗恩·奥卡特（Ron Aucutt）**的一篇精彩文章——*《信条还是准则：家庭顾问的使命》*，该文发表于美国信托与遗产顾问学院（ACTEC）《法律期刊》2011年春季刊。 若非这三件事在近日交汇，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鼓起勇气分享下文中的感想——尽管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对“精神资本”等部分议题直言不讳。

我深有同感——罗恩·奥卡特坦率承认自己撰写“家庭顾问”这一主题的资历是“虚假的”。罗恩坦言：“我

并不做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谈论的那些事。总体而言，我从未做过这些，或者说，即使我曾尝试去做，也做得并不
好。”我想，在“家庭咨询师”这个话题上，我们所有人的资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虚假的，而且我们往往没有在自己的家庭中践行那些我们建议客户在他们家庭中去做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市场情绪以及客户的需求，其中仍有一条值得深思的信息。
美国人对遗产规划有何看法？根据WealthCounsel 2016年的《遗产规划认知调查》，“困惑”最能描述美国人对遗产规划的感受。事实上，当被问及遗产规划是否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时，四分之三的受访者（74%）给出了肯定回答。尽管近年来财政部和难以预测的政治局势并未为规划带来多少清晰度，但我们能够也应该做得更好。

任何通往清晰之路，都应从简化和重新定义遗产规划开始，深入审视自身的资产与价值观，并通过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致力于提升家庭的“*追求幸福*”能力。请注意，这一理念并非“新世纪思潮”；它也不是新兴的“幸福科学”或“积极心理学”的最新发现。相反，其中很大一部分源于与过去历久弥新的智慧重新建立联系——这种智慧，我们的建国先贤、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都了然于心。我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激励我们所有人，为我们有幸服务的家庭提供更优质、更明智的建议。

评论：

我也不太确定自己究竟是如何踏入财富与遗产规划领域的。坦白说，在法学院期间，“遗嘱与信托”这门课是我成绩最差的科目之一。 或许，ACTEC资深会员鲍勃·柯克兰（Bob Kirkland）的建议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他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选择这一执业领域，是希望不仅能在家庭财富规划的财务层面协助客户及其家人，还能在处理家庭事务时的实际、道德和心理层面提供支持。”

罗恩·奥卡特（Ron Aucutt）恰当地强调：“遗产规划师绝不仅仅是信托或税务技术人员。”罗恩说：“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家庭的顾问，肩负着培育、滋养、巩固和

实现家庭价值。”杰伊·休斯同样以家庭顾问的视角阐述道：“帮助每位家庭成员在通往整个家庭繁荣的幸福之路上不断前行。”

罗恩提醒所有ACETC院士——实际上也提醒我们行业内的每一位从业者——我们的首要职责既不是资产保护，也不是税务规划。对于跨学科规划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而言，首要职责是有效协作、担任家庭的顾问、将家庭利益置于首位，并“为了家庭的存续与强盛，鼓励家庭内部进行最充分、最自由的对话。”

家庭财富中的遗产规划是什么？

牢记我们的首要职责，向更佳范式的转变始于改变我们在财富规划行业中长期以来对遗产规划的定义方式。坦率地说，大多数关于*“遗产*规划”的定义都晦涩难懂、冗长乏味、以资产和税务为导向、过时陈旧；如果我们
在进入这一行业之前就发现并真正阅读过这些定义，我们很可能早已选择了另一条职业道路。

举例来说，维基百科将遗产规划定义为“一个人在世期间，为生前及身故后遗产的管理和处置进行预先规划和安排的过程，同时尽量减少赠与税、遗产税、代际跳跃转移税和所得税。”

一个针对CFP®认证的在线学习资源（Course Hero）同样将“遗产规划”等同于“预先规划和安排遗产处置的过程，其中遗产规划通常指对个人资产的有序安排，以最有效地满足其生前的经济需求，以及其希望在去世后受益之人的个人和经济需求。”

难怪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遗产规划感到困惑。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着诚意竭尽全力，努力寻找恰当的措辞，以便在鸡尾酒会上被问及时，能向人们解释清楚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选择坐在宴会厅里人较少的角落，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在家族财富的语境下，我提出以下关于**财富与遗产规划的**简化定义：***“通过积累、保全和***

提升家庭价值，通过个人资产与价值观的积累、保全和分配来实现。”毫无疑问，这明确突出了我们对客户的首要职责。 然而，要使这一定义获得实质性的认可，它需要顾问、法学教授以及ACTEC、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和NAEPC等专业组织的共同支持。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个人的资产与价值观。

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资产***既包括经济资产，也包括非经济资产。“家庭财富不仅仅局限于财务层面，”查尔斯·W·科利尔（Charles W. Collier）如此认为。科利尔接着援引了当今广为人知的四种资本，这些概念最初由杰伊·休斯（Jay Hughes）在其著作《*家庭财富：让财富留在家族中*》（*Family Wealth: Keeping it in the Family*）中提出。

科利尔所提及的四种资本如下：

1. **人力**资本——指家庭中的每位成员：他们的知识、才能、精神追求、价值观、热情、梦想和抱负。最重要的是，这一术语还指他们如何定义自己被召唤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被召唤去做什么。
2. **智力资本**——涉及个人一生的学习方式，以及家庭成员如何沟通、解决冲突、共同决策并相互指导。
3. **社会**资本——指个人与其所在社区的联系。它通常体现为关怀与公民参与。
4. **金融资本**——反映了财富的传统定义，例如家庭房产、金融资产、信托、合伙企业以及其他投资和遗产规划安排。

休斯的核心论点是：仅靠金融资本无法实现长期财富保全。世界各地的家庭往往沦为“三代人从衣袖到衣袖”这一谚语的牺牲品。 第一代积累财富，第二代保全财富，第三代挥霍财富，第四代则必须重新积累财富。在休斯看来，只有当家族将部分金融资本投入到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增长中时，才能实现长期财富保全。届时，金融资本便成为家族内部发展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强大工具。

几周前我见到杰伊·休斯时，曾问他：“你不觉得还缺了一种资本吗？难道不应该将

第五种资本——精神资本——

被纳入其中吗？”杰伊微笑着说，他在该书首次出版的后期曾试图将精神资本纳入其中，但由于出版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最终只能在序言中表达对精神资本的见解。 然而，多年来，杰伊一直坚持谈论五种资本，其中精神资本就是第五种。

因此，经杰伊许可，我想就第五种资本提出以下供刊载的定义：

5. **精神资本**——指个人以精神（*开明*）的自利为出发点，辨识并运用自身独特的天赋与优势、梦想与渴望的行为。

虽然我将在后文更深入地探讨“精神资本”的概念及其与美德和追求幸福的联系，但在此先说明一点：精神资本并非关乎宗教虔诚，也并非否认自利的重要性，更不是贬低价值观的重要性。
相反，精神资本是指秉持开明/精神层面的自我利益行事，践行美德，并力求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精神资本不仅值得被单独归类，它很可能正是所有资本的基石。

个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理解与记录——对于金融资本的背景以及继承者所声称的真正愿望而言，都至关重要。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篇应时而出的文章指出：*“家庭价值观，而非金钱，才是最好的遗产。”*这些结论来自由安联北美人寿保险公司赞助的“2012年安联人寿美国遗产研究”。该研究调查了47至66岁的“婴儿潮一代”，以及被称为“长者”的72岁及以上人群。

第二次调查的结果与该公司2005年发布的首份遗产研究报告高度吻合：当时77%的受访婴儿潮一代表示，他们能获得或传承的最重要遗产是价值观和人生经验。事实上，对婴儿潮一代而言，价值观的重要性是金钱的10倍。 安联的这项第二项研究再次证实，那些思考遗产和继承问题的人仍然认为，传承个人和家庭价值观是他们能留给继承人的最重要的遗产。毫不奇怪，家庭故事被视为对延续家族历史和保留家庭记忆至关重要。

美林证券与Age Wave合作开展的2013年退休研究（《美国人对新退休现实与长寿红利的看法》）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被问及最应传给后代的是什么时，价值观和人生经验位居首位——其重要性是金钱和金融资产的两倍多！

作为履行首要职责的理财顾问，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并努力理解家庭的价值观、使命和目标。为此，我们或许需要修订传统的规划问卷，并尝试提出更具前瞻性的问题，例如：哪些价值观对您来说很重要？您为什么认为这些价值观对您的家庭很重要？ 能否分享一个与这一价值观相关的亲身经历？您的家庭目前拥有哪些共同价值观？您希望他们拥有哪些共同价值观？您认为对您和配偶、对子女以及对慈善事业而言，多少才算足够？您的子女有哪些独特的才能、梦想和热情？如何审慎地利用您的金融资产并将其投资于他们身上？

当我们开始提出真诚、关怀且开放式的问题时，便开始建立信任并更好地理解客户。重要的是，当我们积极倾听客户的回答并与他们确认我们的理解时，这对客户而言具有真正的价值。为了理解而倾听，而非为了被理解而说话，这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影响深远。

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罗杰斯曾这样说道：“倾听是我们所知最强大的力量，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基本结构，并改善他与他人的关系和沟通。 如果我能倾听他所讲述的内容，如果我能理解在他看来事情是怎样的，如果我能看到这对他的个人意义，如果我能感知到其中对他而言的情感色彩，那么我将释放出他内心的一股强大力量。”

因此，正是通过提出更好的问题并认真倾听答案，我们才能理解家庭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目标和
优先事项。当我们成功做到这一点时，个人的价值观便可作为财富规划的基石，以此为基础制定计划，并将其融入遗产规划之中。然而，这一切始于文件本身，以及对一个事实的坦诚承认：这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堪称人类已知最具法律术语色彩、最枯燥乏味、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模板的文件。

这些文件充斥着法律术语，往往缺乏任何个人情感，可能成为与家人之间一种疏远且最终的交流。情况非得如此吗？

客户在遗产规划文件（尤其是大多属于私密的信托文件）中更多地体现个人意愿并不违法，花几分钟时间与客户探讨这种做法，难道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最佳实践吗？ 为什么一份遗产规划文件可以有这么多页，详细探讨受托人继任、代际跳跃税、挥霍条款和不可争议条款等事项，却连一页纸的篇幅
用于阐明设立人对其家人的真挚意愿？或许，将一封表达心意的“情书”纳入标准遗产规划方案中更为合适？

请参考以下可撤销信托的“序言”，作为一种情境建议，这类内容可以轻松地插入到文件开头附近。 此示例可能适用于有一对十几岁子女的离异父母。

为起草人的意图和情境价值留出空间

紧随这段简短引言之后的文字或许具有更强的法律意义，但与我对你们每个人的爱与期许相比，其意义便相形见绌。我制定遗产规划的目的，不仅在于节省财富转移税和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你们每个人并赋予你们自主权。 我决定将大部分遗产置于信托中，并安排你们每人暂时与一家公司受托人共同担任各自子信托的共同受托人。请明白，我信任你们每个人，但我也相信，将资产置于信托中能提供直接分配所无法提供的保障。

请明白，我认为你们都是负责任的年轻人，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在你们年满30岁之前（此后你们可以担任唯一受托人），让你们与一家公司受托人共同管理，以提供专业指导，并在做出财务决策时起到审慎的制衡作用。成熟只能通过生活经历获得，而情绪往往会蒙蔽我们最明智的判断。如果任由我们自己做主，每个人都可能做出愚蠢的投资决策。正如

话虽如此，没有人能避免在理财方面偶尔犯错。我知道我自己也犯过不少错误。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按照信托条款，明智地使用留给你们的资产，以此发挥你们独特的才能和热情，帮助你们将来养育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并将部分资产捐赠给慈善机构。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但请务必将感恩、慷慨和信仰作为首要的美德来培养，因为没有这些品质，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无法过上幸福或充实的生活。请投资于健康，并考虑如何在物质之外，与彼此、朋友及社区共同创造生活体验。去旅行，腾出时间欢笑和享受乐趣。 请投入一些时间和金钱去践行慈悲之心，并服务他人。这方面有许多途径可供选择，我相信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喜悦。我希望你们能延续家族传统，每年向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捐赠一定数额，以帮助照料国内外最贫困的人群。当然，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部分遗产捐赠给其他打动你们的慈善机构。

情境价值观固然重要，且很可能被WealthCounsel和Interactive Legal等行业领军企业轻松融入正式的规划流程中。但除了情境价值观之外，真正将价值观传承下去的能力又该如何考量？试问，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可以、也应该强加于人吗？价值观（至少对成年人而言）难道不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而不是被他人强迫接受吗？ 还有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常识*》中那句著名的箴言："当我们为后代做规划时，应当记住，美德（*以及由此延伸的价值观*）并非遗传的。"

向继承人"展示"而非"强加"价值观

基于价值观的规划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敏感领域。毕竟，如果生前未能将价值观灌输给子女，死后又有多大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呢？一个更好、更有效的方案，或许在于仅仅向子女展示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

尽管如此，“成熟度指标”在信托分配中的应用正日益普及。 从经认证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结婚生子、购买第一辆车或第一套房子、撰写一份需要融资的精心制定的商业计划、事业有成、远离破坏性或成瘾性行为，以及让信托与受益人自身的财务投入相匹配或倍增——这些都可能是完全恰当的方式，既能提供激励，又能根据后代的价值观进行信托分配。

在信托中纳入经济激励措施，以鼓励继承人成为身心平衡、对社会有益的成员，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然而，
试图通过成熟度的指标来激励继承人的行为可能会遇到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的受托人，如何能够常规且有效地监督这些指标。除非某项指标易于且客观地衡量，否则其监督可能流于零星且带有主观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被继承人的价值观和金钱来激励外部行为，可能会阻碍继承人发现自身热情、内在动机以及追求幸福的能力。在起草信托时应谨慎行事，避免过度依赖被继承人的价值观以及为继承人设定的外部行为目标。

或许更有效的方法是（当继承人年岁足够时）征询他们对自身天赋、目标和热情的见解，然后设计相应的、由信托提供激励的适当行为活动，以此赋能他们。通常，一种包含某些成熟度指标的多维度方法，是根据价值观进行信托分配更有效且更全面的方式。而且，我们究竟应该采用谁的价值观呢？

几年前，有一对令人难忘的夫妇，不出所料，他们对财富传承的看法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均拥有常春藤盟校的硕士学位，分别主修会计学和金融学。就妻子而言，她希望在自己和丈夫在世时就与子女分享他们的财务成就，并希望孩子们知道，如有需要，他们的资产随时可供使用。她不希望子女不得不等到年事已高才能继承遗产，也不希望因为某个孩子选择结婚生子、

在职场中步步高升，或是单纯作为一名艺术家，无论收入高低，都凭借天赋追寻自己的热情。

而丈夫则担心，如果钱来得太容易，会削弱孩子们发挥天赋和才能的动力。 丈夫凭借霍雷肖·阿尔杰式的“自力更生”精神取得了相当大的财务成功，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加入他所认为的那个日益丧失生产能力与生产需求的消费者社会。他主张将信托分配的大部分与成熟度的标志挂钩，以此作为激励机制。

尽管在制定遗产规划方面看似存在分歧，但这对夫妇通过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找到了共同点。部分资产按年龄分配，部分资产根据成熟度指标分配，而遗产的大部分则以信托形式为子女保留。

在财富的恰当使用及分配时机问题上，配偶之间的价值观很容易产生冲突。同样，商业价值观与家庭价值观也因其本质而经常发生冲突。

商业价值观与家庭价值观——寻求共同点

在商业世界中，人们往往重视业绩、贡献和利润最大化。相反，在家庭世界中，人们通常重视平等、无条件的爱以及情感和谐。同时兼顾这两方面有时会显得有些尴尬，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或最和睦的家庭也不例外。

回想几年前发生在雅诗兰黛（一家家族企业）身上的事，不禁令人深思：当时威廉·兰黛（时年47岁）辞去了他长期被培养接任的首席执行官职位。当威廉考虑收购另一家公司，以使雅诗兰黛进入全球化妆品大众市场时，这家化妆品集团的基础似乎开始出现裂痕。

此次收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进入CVS等大众市场分销渠道，减少对百货商店销售的依赖。这一策略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直到其他家族

成员——即威廉的父亲伦纳德和叔叔罗纳德·劳德——开始插手此事。

伦纳德对业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周都会与威廉会面，期间还给他寄去许多亲笔便条。伦纳德目睹了这家公司是以利用与百货公司的关系为基石建立起来的，他担心会疏远这些合作伙伴，因此反对此次收购。

罗纳德则认为此次收购将有利于销售额和股价的提升，因此支持收购。在决定如何行事时，威廉陷入了公司两大主要股东之间的夹缝，同时也与家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分歧。

威廉常说："作为首席执行官，我对所有股东都负有责任。我的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听过这句话，尽管他们并不领情。"他进一步评论道："面对那些还记得你小时候样子、随时都能给你家里打电话的董事会成员，处境并不容易。"

后来有一天，威廉向董事会宣布他希望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并希望新任首席执行官从家族外部引进，这一决定令董事会大为震惊。威廉代表了许多家族企业掌舵者的心声，他表示："既要处理首席执行官必须处理的各项事务，又要管理与亲属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不仅与你有血缘关系，而且你一生都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
。"

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　　每一家企业都面临着挑战。据罗伊·威廉姆斯和维克·普雷瑟所言，跨代家族无法代代传承财富，首要原因正是信任与沟通的破裂。因此，在制定家族使命宣言、参与家族慈善事业等有意义的活动中寻求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或许能为家族的繁荣提供更高层次的支撑，助力两者共同繁荣。

家族使命宣言可以为围绕家族核心价值观开展合作提供一个有意义的机会。同样，让家族成员参与慈善活动有助于加强家族关系，并营造共同的目标感。制定一项战略性捐赠计划

往往是管理那些对代际家庭福祉至关重要的价值观的关键。作为顾问，我们在这一重要领域是否已竭尽所能？　　客户在生前常向慈善机构捐赠，却往往在临终时未能如此，这似乎令人费解？是死亡这个话题改变了他们的心意，还是我们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建议？拉比莫迪凯·利布林（Rabbi Mordechai Liebling）这样说道："你的遗嘱是你最后的教诲。你希望它展现什么？"

去年，我终于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为家人设立了一个捐赠者建议基金。坦率地说，我厌倦了自己长期以来的虚伪——我一直推荐这种规划方式，以此将家人凝聚在一起，参与比家庭本身更宏大的事业，却始终未能身体力行。 我希望我十三岁的女儿伊丽莎白不仅能更深刻地了解父母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通过亲自调研并挑选几家慈善机构，开始形成她自己仁爱的价值观。没错，孩子们会认同自己的家庭和家庭价值观，但他们也必须学会从家庭中独立出来，形成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有效的商业传承规划必须在成功转移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同时，保持家庭的完整。杰伊·休斯在与家庭及家族企业合作时，常强调谦逊与感恩的美德，并致力于寻找共同
，让每位家庭成员都致力于增进彼此的幸福。　　本着这一理念，本文剩余部分将致力于探讨美德、对幸福的追求以及精神资本的重要性。

美德——价值观的"超级食品"

每个家庭成员、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套价值观。要在家庭成员之间发现若干共同价值观，需要付出一番努力。
此后，确定一套要代代相传的有限核心价值观，则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家族治理。最后，要精准锁定那些既能带来个人幸福，又能让整个家族繁荣发展的具体价值观，则需要对美德有基础性的理解。

如今，"价值观"与"美德"常被混为一谈，虽然二者相关联，但它们的倾向和结果可能截然不同。一方面，作为顾问，我们理应重视帮助客户

合法地最大限度地降低所得税和遗产税。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来看，我们可能已经默认接受了这样一种“现代价值观”：即政府规模远超我们愿意通过纳税来承担的范围。同样，未来必然会发生的、社会债务在代际间的大规模转移，绝非一种美德之举。

所有美德都是价值观，但并非所有价值观都是美德。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听起来像是一种美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个人的自由既可以用于行善，也可以用于作恶，或用于介于两者之间无穷无尽的行为与价值观。 然而，美德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排他且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美德需要自由，以便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美德，但自由的长期存续则完全取决于选择美德。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美德与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不妨考虑这样一个例子：选择麦当劳的“开心乐园餐”是一种饮食选择，但它绝不能被视为像羽衣甘蓝、菠菜或蓝莓那样的“超级食物”。同样地，美德就是价值观中的“超级食物”。

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曾就色情内容发表过一句名言：“我看到它时就知道它是什么。”这一说法是否也适用于美德？我们这些从事基于价值观规划的人，在看到美德时能否认出它？当家庭试图根据美德来选择和审视其核心价值观时，我们能否提供恰当的建议？

问题：请考虑以下两组价值观。两组都包含合理的价值观，但哪一组更能体现“美德”的概念？

A组：成就、美、舒适、创造力、教育、自由、灵活性、幸福、锻炼、健康、知识、开放沟通、个人成长、隐私、财产、自我表达。

组B：审慎、正义、坚毅、节制、勇气、仁爱、诚实、谦逊、仁慈、希望、感恩、信仰、忠诚和荣誉。

答案：B组更能体现美德。但为什么呢？

价值观往往是宽泛的、个人的且相对的。正如当今常言：“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而美德则是一个

更狭义的术语，代表着一套经过筛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客观的善，且在道德上值得推崇。

正是我们的美德，而非价值观，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家庭成员、更好的社会公民。特别是美德，而非泛泛的价值观，才能让一个人在追求幸福时，其道德指南针更准确地指向北方。我们对美德的理解可以作为帮助客户做出明智选择的必要基础，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美德不仅是一种正确的习惯性倾向，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更是行善的正确行为。例如，某人可能声称自己秉持“勇气”这一价值观，却依然无法勇敢地行动。此人或许正确地珍视勇气，但在勇敢的行为上却缺乏美德。

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美德是两种极端之间的合理中点。以勇气这一美德为例，它被视为逃避危险的懦夫与盲目冲入险境的鲁莽之徒之间的实践中点。一个勇敢的人会在必要时果敢地面对那些恰当的危险。

“美德”是我们的开国先贤们经常使用且理解透彻的一个术语。那56位敢于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在签署时深知自己的财产极有可能被没收或毁坏，若被捕，甚至可能面临处决。仅仅签署这份文件就意味着他们犯下了叛国罪。但开国先贤们具备了公民美德——勇气——所要求的品性与正确行为。 他们将不可剥夺的权利视为至高无上，并以同胞的共同利益为重，因此勇敢地践行了《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为了支持本宣言，并坚定地信赖神圣天意的庇护，我们彼此誓言，奉献我们的生命、
财产以及我们神圣的荣誉。”

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和美德观念应用于信仰，并确立了理性与启示应相互交织，二者共同引导我们走向相似的行为准则。但正是亚里士多德，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提出：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

培养美德。这一理念对美国以及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追求幸福——精神资本的重要性

时间是1776年6月11日。 国会刚刚任命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起草《独立宣言》。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都在该委员会中，但两人都不愿率先起草宣言初稿。最终，亚当斯说服了杰斐逊，认为杰斐逊必须率先起草，理由是应该由一位弗吉尼亚人来撰写，杰斐逊在国会眼中更平易近人，而且两人中他显然是更好的撰稿人。

于是，起草初稿的重任便落在了杰斐逊一人肩上。肩负着新共和国的沉重责任，杰斐逊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他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参考了《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以及自己起草的弗吉尼亚宪法草案等文件。

然而，更重要的是，杰斐逊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最著名的观点或许就是提出：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 然而，杰斐逊却具有先见之明地决定有意淡化洛克关于财产的传统观念，转而强调洛克、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关于“追求幸福”的另一种更广泛的观点。

杰斐逊的序言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家庭使命宣言，并成为家庭治理的标志。这段文字帮助界定了我们政府以及我们作为美国家庭的身份所依据的原则。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表述逐渐成为新共和国所追求的道德标准。

因此，我们要感谢杰斐逊（他汲取了洛克、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思想）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展现出的智慧——他认识到，幸福虽然包含财产，但更

更广泛、更根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些从事家族财富与遗产规划行业的人，虽然主要依靠客户对财产的追求和传承来谋生，但作为顾问，我们最高的使命是帮助个人和家庭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获得成长。

任何研究美国历史的人都会深切体会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无论其具体的宗教信仰如何——都一致认为，我们的不可剥夺权利是由造物主赋予的，而美德对于维护共和国而言不可或缺。在开国元勋们看来，通往幸福的道路在于充分运用个人的天赋、热情和资源，以符合原则的方式追求具有精神层面的自我利益。 有意义的社区、共同利益和公民美德等理念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开明的公民而言更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诚然，《独立宣言》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杰作。它巧妙地融合了神学、启蒙运动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的洞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国先贤们本身就应被视为在“追求幸福”中提出了“精神资本”重要性的先驱。他们或许并未将其称为“精神资本”，但我们所有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独特的禀赋与渴望，以及他们所设想的人类繁荣，同样都依赖于精神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开明的（精神）自利”这一概念，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美国的民主》（1835年）*中曾有所论述。托克维尔通过“正确理解的自利”这一表述指出，美国人既维护为私利而结社的权利，又秉持行善的美德。*《美国的民主》*中的以下段落概括了“开明的或精神自利”这一概念：

> *相反，美国人喜欢用“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原则来解释他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行为；他们自豪地展示，一种开明的自我关切如何不断促使他们互相帮助，并使他们乐意为国家的福祉牺牲一部分时间和财产。（同上，647）*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资本是最容易理解、也是最根本的资本。简而言之，正是我们所有人的造物主赋予了我们这种

资本的授予者。正因如此，精神资本不应被不加区分地混入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之中，因为精神资本并非源于人类或社会。对开国先贤而言，这种最初由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构成的超验资本，无法被人类法律废除或限制。根据自然法，这些神圣的权利属于非经济性资产，不能被剥夺、否认或转让。 既然这种无价的资本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赠予，它便没有市场价值——在国税局706表格上，它的价值为零。然而，当开国先贤们冒着生命、财产和神圣荣誉的风险时，精神资本却成为了新共和国的基石资本。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跨学科扩展规划团队中包括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人物，他们会如何论述幸福呢？　　首先，这个扩大的团队中绝不会有人粗心到说，幸福主要源于自我满足，或是通过追求“普遍的价值观”来获得。
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中。他们每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宣称，唯有通过美德——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公民美德——才能实现社会的幸福。

我们几乎能听到他们集体的智慧之声，敦促我们在追求幸福时成为道德主体，并让美德之光指引我们前行。唯有在集体美德的氛围中，政府才不会干涉任何人的幸福追求——只要这种追求不侵犯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对开国先贤而言，真正的幸福需要一份社会契约，他们试图在自主与互赖之间取得平衡——实现自我、家庭和社区的完善。

人们或许容易将精神资本视为某种神秘而遥远的遗物。然而，联合国发布的2016年《世界幸福报告》却表明了相反的观点。 该报告指出，与单独衡量的收入、贫困、教育、健康和善政相比，幸福感更能反映人类福祉。报告得出结论：人类的繁荣与共同利益直接相关，而追求自身幸福的最高原则，就是热切地关心他人的幸福。

虽然追求金钱是必要的，但这并非获得幸福的最可靠途径。正如我们所见并能亲身印证的那样，金钱有时甚至会成为情感上的负担，而非经济上的收益。

由强生制药集团继承人杰米·约翰逊制作的纪录片《生而富贵》（Born Rich），探讨了10位年轻成年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之女伊万卡·特朗普和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之女乔治娜·布隆伯格）所承受的继承财富带来的负担。约翰逊拍摄这部影片的动机源于他的担忧：有钱人往往不愿谈论财富，且常怀有内疚感和不堪重负之感。

如今，幸福学证实了我们很久以前就直觉上知道的许多道理。根据近期上映的纪录片《幸福》（2011）所述，我们可以通过专注于以下有意识的活动来提升幸福感：

- **心怀感恩**——例如，每周花一点时间写下五件值得感恩的事情，这一简单举动对提升幸福感具有可量化的效果。
- **与朋友、家人及社区保持联系**——那些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与朋友、家人及社区互动中的人，显然更幸福。
- **慈悲心/服务他人**——那些致力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表示自己更幸福。

当前关于消费与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将钱花在体验而非物质物品上时；当他们在购买前认真评估所购物品的价值时；以及当他们不再试图在“与邻居攀比”中保持领先时，幸福感会更高。因此，通过度假或娱乐购买有意义的体验，通常比购买电视和汽车等物质物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选择如何度过每一天来留下自己的遗产的。 或许，帮助客户过上幸福生活的最明智建议，就是不时将谈话重点从追求或传承财务繁荣，转向实现情感繁荣。归根结底，正是这种“第五种资本”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的福祉不可或缺。作为所有其他资本的基石，精神资本使个人、家庭和社会都能蓬勃发展——高尚地追求幸福，并实现持久的财富。

结语

随着一月的临近尾声，制定崭新而有意义的新年决心仍为时不晚。让我们在今年下定决心，让家庭财富与遗产规划变得更清晰易懂、更具个性化，并帮助客户传承他们的价值观。作为顾问，让我们以真正的顾问身份通力合作，采用新的最佳实践，或许包括以下几点：

- 在学术和机构层面更新遗产规划的定义；
- 强调经济和非经济资产，以及客户的价值观和美德；
- 在标准表格中添加前言部分，或另写一封信说明背景信息；
- 通过使用更佳、更开放式的探索性问题，积极倾听客户心声；
- 向继承人展示客户的重要价值观和美德，但不要强加于人；
- 在家族使命宣言和超越自我的慈善行为中寻求共同点；以及
- 通过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努力提升个人对幸福的追求。

无论今年国会是否会呼吁修改所谓的“遗产税”，我们都应认真考虑客户当前对变革的呼声。事实上，家庭财富与遗产规划确实存在更优的范式。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为客户提供这一方案，真正成为超越信仰与准则的顾问。

希望这能帮助您协助他人创造*积极*的影响！

查理·道格拉斯

引用方式：

LISI遗产规划通讯第2507期（2017年1月20日）

http://www.leimbergservices.com 版权所有 2017 查尔斯道格拉斯。未经莱姆伯格信息服务公司（**LISI**）明确许可，严禁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发给任何人。

引用文献：

“家庭价值观，而非金钱，才是最好的遗产”；《美国人对退休新现实与长寿现象的看法》；艾伦·拜伦，《紧张局势搅动雅诗兰黛王朝》，《华尔街日报》，2008年2月27日；罗伊·威廉姆斯和维克·普雷瑟，《培养继承人：实现家族财富与价值观成功传承的五步法》（2003）；《2016年世界幸福报告》。